

文翁石室的办学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徐敦忠

文翁石室是全国第一所地方办的学校

文翁名党，庐江舒（今安徽舒县）人。“少好学，通春秋”，具有渊博的学识，“以郡县吏察举”。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为蜀守”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修水利，“穿湔江口^①，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二是办学校，“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自从修筑了都江堰后，成都平原大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物产富庶，是一个经济上相当繁荣的地区。但是，文化教育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文翁担任蜀郡太守后，除“穿湔江口”，即开蒲阳河，灌溉灌县东部及彭县、新繁大片田地，继续扩大都江堰的灌溉效益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好文化教育，改变蜀地精神文明的落后状态方面。

文翁办的学校在哪里呢？《华阳国志》说：“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精舍”即学校，是用石头建造的，“城南”即成都南门，现成都石室中学校址。从此，“文翁石室”便成了文翁所办学校的代名词。

文翁石室办得颇有特色，声誉卓著，很

快成为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蜀地文化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仅仅十多年时间，“麟萃蜀学，比于齐鲁”，便赶上了当时文化教育非常发达的先进地区——齐鲁。接着“巴汉亦立文学”，川东、川北一带也办起了学校。地方政府办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效，这在西汉初年实在是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一桩极好的经验，当然引起西汉王朝的极大注意。据《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记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石室确实成了全国第一所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

文翁石室的办学特色

文翁石室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誉，以至汉武帝下令全国各郡仿效文翁兴办学校，是由于这所学校办得好，办得颇有特色。

首先，文翁石室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文翁作为蜀郡太守，在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修建起学校，这对仅有成都、郫、繁、广都、临邛等十五县的蜀郡财政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是，还要派教师到长安“受业博士”，进修培训。进修经费从哪里来？据《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记载：“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贲计吏以遗博士。”注^②：“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也就是说，文翁把自己机

关的开支节省下来作为教师的进修经费。文翁不仅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学校，而且亲自过问教学，“亲自飭厉”学生，因而鼓舞了师生的积极性。这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传统，一直流传到后代。如从汉朝到清朝，文翁石室先后遭遇两次大火：一次是汉安帝永初年间遇火，“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为灰炭，独留文翁石室，庙门之两观。”汉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眺为蜀郡太守，乃循旧筑周公礼殿、“兴复第馆”。一次是清初遇火，“俎豆之地，为豺狼之所穴，狐鬼之所嗥”。四川巡抚佟凤彩重建大成殿及左右学舍，于顺治十八年十月开始，越康熙二年九月竣工。两次火灾之后，都是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出面主持，修复了学校，规模都比以前扩大。又如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年间（公元960年）宰相毋昭裔开始在文翁石室刊刻石经，北宋时继续补刻，直至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01至1125年）才将儒家十三经刻完，历时一百多年，共有几千块石板。这是何等巨大的工程！再如汉以后抚蜀的地方行政长官到任后便要视察文翁石室，《四川通志》载有清朝初年四川巡抚佟凤彩写的《修成都府学记》一文，详细地叙述了他视察的情况：“岁辛丑，予受命抚蜀，驻节锦城，循故例，视事三日，味爽谒先师孔子庙，集博士弟子升堂鼓篋，称说六经，盖效周礼大司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者也。”视察后，佟凤彩即着手重修文翁石室。他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那种无钱办学、“先富后教”的说法：“博士复揖而进曰：‘昔夫子之策卫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今士民其疾，靡有孑遗，硕鼠集鸿，捉襟见肘，孜孜建学兴文，不其迂欤？’予曰：‘嘻！学校，王政之本也。夫子之言，谓非教无以保富庶，非谓待富庶而后议教也。若二三残黎，不使之揖让夫子之堂，偃然气然，习其衣冠剑履，观感兴起于

善，将见三纲沦，九法斁，反浸淫于佛老之教，渐趋于邪，窃恐杀运之不殄也。’诸生唯唯而退。”

其次，文翁石室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文翁，既是“仁爱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又是“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他既有崇高的威望，又是文化教育的行家里手。对于校舍的修建，师资的培训，招生的办法，甚至教学的安排等，门门精通。这样的人担任校长，学校自然会办得很好。解放以后，在成都北郊发现的东汉画像砖中，有一幅表现课堂教学的图像（现在省博物馆展出）。出土时，有人名之为《文翁传经图》，比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石室教学的真实情景。图像是：西面置一长方形的台，上一人东向似盘膝危坐，着长裳，双手交置于前，头戴延前仅垂有三旒的简化的冕（按：旒，天子十二，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其余三面东一人，南三人，北二人，均跽坐于毯席之上，头戴一般文士常爵的弁（一种冠），着长裳，双手捧简。唯面向西的人可见腰带上系有一把削简字之误的书刀。从这些人的造型、服饰和布局来看，西坐者为教师，正在严肃认真地讲学，其余六人则是毕恭毕敬专心听讲的学生。当然这不一定是文翁在讲学，但文翁当时管石室的教学、“亲自飭厉”却是事实。《文翁传经图》发现在成都附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为研究四川教育史增添了形象的实物史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担任校长这一文翁石室的宝贵传统，也一直流传到后代。清朝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按察使刘德方建锦江书院。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丰都易简为院长。易简字位中，康熙壬辰（公元1712年）进士。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甌宁郑方城为院长。郑方城字则望，雍正癸丑（公元1733年）进士。乾隆十

六年(公元1751年)宜兴储学文为院长。储长文字越渔,康熙丁酉(公元1717年)举人,四川纳溪县知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金堂高辰为院长。高辰字景卫,号白云,乾隆辛未进士(公元1751年),历官礼部主事,江南凤阳府同知。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华阳顾汝修为院长。顾汝修字息存,号密斋,乾隆壬戌(公元1742年)进士。历官詹事府右赞善,顺天府府尹,著有《味竹斋诗文集》。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丹棱彭端淑为院长。彭端淑字乐斋,雍正癸丑(公元1733年)进士,历官吏部堂主事、文选司郎中、广东肇罗道观察使,著有《白鹤堂诗文集》《雪夜诗谈》等。从清朝雍正至乾隆时期锦江书院六届院长来看,均是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知名之士。

第三,文翁石室有较强的教师队伍。严羽《沧浪诗话》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只有教师学问渊博,见识过人,才能培养出具有高水平的学生。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遣博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张叔知识渊博,有著述,他“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文翁石室有象张叔这样很强的教师,所以学校越办越好。这一宝贵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如宋代成都府学教授家安国,便是知名之士。家安国,字复礼,眉山人,博学举进士。后随韩存宝征乙第得官。既而诸公举之,得成都教授,苏轼《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诗云:“别君二十载,坐失两鬓青。吾道虽艰难,斯文终典刑。……新科复旧贯,童子方乞灵。须烦凌云手,去作入蜀星。苍苔高映室,文翁古柏庭。初闻翰简香,始觉铎鏖腥。……吾侪便归老,亦足慰余龄。”公元1902年改锦江书院为成都师范学堂。1904年更名为成都府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成都

联合县立中学,在这段时间,四川的知名人士刘豫波、林山腴、赵少涵、杨沧白等都在这里任过教;在数理科方面多系国内著名院校的毕业生或留学生担任教授。根据资料记载,数理科及外史、外地等科的教材还采用过英文原本。

第四,文翁石室的招生办法择优录取。招生的地区范围是“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据颜师古的解释:“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这就是说,文翁石室招生,不限于成都市区,范围广大得多,包括了蜀郡所管辖的十多个县,这就提供了充足的可供选择的生员,招生的标准是“开敏有材者”,要挑选那些思维灵活、反应敏捷、智力发展好、有相当才华的尖子生入学。由于这样,文翁石室便不是为贵族子弟们开设的。恰恰相反,进入“学官”的学生倒是一般老百姓的子弟居多。据《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这些学生入学后,国家“为除更徭”可见,如果不入学,他们是要从役的。因为进入文翁石室不容易,很荣耀,“富人至出钱以求之”。从出钱这点上看,颇有点象今天的集资办学、出钱培训,而这又证明文翁石室虽不敢说是人民的,至低限度它是最接近人民的。所以它大大地提高了蜀郡的文化,也就是深深地孕育了西南的文化。文翁石室这种择优录取的办法,也一直流传到后代。据《四川通志·舆地志》记载:

“康熙四十三年按察使刘德芳修复之,建锦江书院。六十年,学使方觀增讲堂学舍三十余间,拔通省士之尤者,延师教之,一时文物称盛。”“通省士之尤者”道出了清朝锦江书院是在全省范围内招生,挑选最冒尖的学生入学。《四川通志·学校志·成都府》说:“成都府儒学在府治南汉文翁讲堂故址。……学额进二十名,廩生四十名,增生四十名,一年一贡。嘉庆四年奉部议准各省驻防旗人,另设学额。就近考试,学政按照人数计,应

试童生五、六人，得取进一名，如佳卷不敷，宁缺勿滥。四川驻防，取进新生，归成都府学。”从“宁缺勿滥”的规定看来，在清代即使对于享有特权的驻防旗人，成都府学招生也是采取严格的择优录取的办法。

第五、文翁石室的教学原则，不光是学习书本知识，还强调实际锻炼。《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说：“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笱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闾阎。”在文翁太守每次到蜀郡所辖各县巡视、考察时，总要从石室选拔一些学习很好、品德端庄的学生同他一道去，叫他们宣扬教化，传达命令。这是学生难得的接触社会，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这一宝贵传统在以后的各个朝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巩固其统治，却没有得到发扬。在清朝初年，在全国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还对锦江书院的学生作了严格的规定，有意识地把学生同社会隔绝起来。据《重修成都县志》记载，清顺治九年曾题准刊立卧碑于明伦堂之左，此一卧碑现存成都石室中学。《卧碑》云：“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但是这种严酷的控制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随着满清封建王朝的衰落，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的传入，到了1909年至1911年，成都府中学堂的学生在一些教师的影响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成都保路风潮的罢市罢课斗争。这一罢市罢课斗争，迅速遍及全川，“南起邛雅，东迄荣隆，西抵绵州，北近顺庆”，千里上下，府县乡皖，形成了一股反抗清王朝的洪流。

第六、文翁石室教育学生的方法是树立榜样，激励学生。据《四川通志·学校志》记载：“成都府儒学在府治南汉文翁石室讲

堂故址。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宫，为礼殿以舍孔子。”可以看出，周公礼殿与石室精舍是同时修筑的。《益州学馆记》说，周公礼殿壁上图画上古益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益州名画录》说：“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刘峻再修玉堂、礼殿，灵宇严肃。……画仲尼四科十哲象，并车服仪器。”周公礼殿，宋时改为大成殿。宋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九月辛巳府学教授范仲夔奏御书“大成殿”额至。大成殿祀孔子；四配：颜渊、曾参、子思、孟子；十哲：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朱熹。东西两廡祀孔子弟子及汉、唐、宋诸代儒家大师。祀奉的这些人，除汉代有道家及帝王等人物外，差不多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唐玄宗开元年时，册谥孔子为文宣王，儒家学说成了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成都府儒学正是把这些人物树为楷模，用以教育、激励学生的。《田况进士题名记》还说到一个情况：“建崇名堂于宣圣殿之东北，尽题皇朝及第进士名，刻于石柱，以示来者。”田况是北宋仁宗时人，北宋把考中进士者的姓名刻于石柱，这也是树立榜样、激励学生的好办法。

文翁石室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李一氓于1983年4月曾亲笔给成都石室中学题写了一副对联。联文是：

锦江春色来天地

石室文风烁古今

对联上面还有一小序：“忆六十年前肄业是旆，原名成都府中学堂，后改成都联合中学校，又改成都第四中学，今夏成都石室

中学以纪念文翁。因借杜甫诗句成联以贺。自汉迄今，谓为‘烁古今’，亦无不当也。”李一氓同志以其高度的概括、精炼的语言，极为正确地评价了文翁石室，阐明了它对后世的影响。“石室文风烁古今”这一论断，文翁石室是当之无愧的。

具体说来，文翁石室对后世有些什么影响呢？

一是历两千年而不衰，开全国地方办学之先河。文翁石室始创于公元前141年，距现在已有二千一百二十七年了，虽历代屡经变迁，却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四川通志·学校志》记载颇详，今撮其要如下：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甲午（公元34年）益州太守文参增造吏舍二百余间。东汉灵帝兴平元年甲午（公元194年）太守高眺修复殿柱，皆正方，上狭下阔，宋时尚存。晋太康中（公元281—289年）刺史张收增绘名贤象于壁间。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修学馆庙堂，贺公亮撰碑记。宋仁宗时知府蒋堂建西学，广诸生齐舍，迄成堂去。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蜀帅范成大修礼殿、学馆讲堂、斋舍，杨中撰记。元泰定中（公元1324—1328年）少中大夫赵世延置贍学田，罗焘撰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知府耿定力重修殿廡门堂、阶垣、斋舍如制。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巡抚佟凤彩捐建大成殿五楹，东西廡各五间，戟门五间，灵星门，启圣宫，明伦堂，敬一亭，左右学舍，坊垣悉具。正因为文翁石室历久不衰，开地方办学之先河，自汉以后，全国地方办学如雨后春笋，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方面的情况，《四川通志·学校志》记载颇详，这里只略举几项：《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置经师一人。”《后汉书·寇恂传》：“建武三年为汝南太守，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晋书·虞溥传》：“太

康时为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文献通考》：“后唐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国子祭酒崔协奏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学官。”《宋史·选举志》：“仁宗即位初，命藩辅皆得立学。”《金史·选举志》：“府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明史·选举志》：“郡县之学，洪武二年，太祖諭中书省臣曰，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等等。

二是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哺育和造就了大批人才。文翁石室开办以来，由于官府重视，教师高明，招生严格，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关于这所学校的校风，唐裴铏在《题石室》一诗中，曾作过如下的概括：

“文翁石室有仪刑，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霭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蝗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羨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聚萤”攻读，裴铏强调的是刻苦学习。清彭端淑在《再掌教锦江书院作》一诗中，又是这样讲的：“文翁遗泽至今崇，三载重来石室中。飘渺亭台通帝座，萧疏桃李点春风。相逢旧友兼新友，自叹衰翁异旧翁。传语诸生相切磋，莫教容易弃前功。”从末两句看，彭端淑强调的是互相学习，刻苦钻研。清末著名文人刘豫波为成都府中学堂题写了一付对联，云：“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这里说的是立志与苦读。究竟如何概括文翁石室的校风才是最好的呢？还是郭沫若于1957年3月为母校题写的对联作了最为精当的概括。对联云：

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
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追求技艺，刻苦努力，团结互助，这便是文翁石室的校风，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正是文翁石室这种优良的校风哺

育和造就了大批人才。宋成都知府田况在《进士题名记》中说：“蜀有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与齐鲁同俗，……国家之起，海内统一，尧文舜明，寔昌以大，其设科考士，擢取之多，则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登进士第者接踵而出，天圣、景祐中，其数益倍。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学而登第者复在数外，事盛也如此，岂非世化治隆，人随而兴乎？主学者议建荣名堂于宣圣展之东北，尽题皇朝及第进士名，刻于石柱，以示来者。予喜闻而遂其请，又为之序。时皇祐二年五月一日也。”宋代益州即是益州成都府，领成都、华阳、郫、犀浦、温江、新繁、双流、广都、灵池等十县，地域比西汉蜀郡还小些，但考进士一榜竟中十八人、二十四人，实在是人才辈出呵！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末年，更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的成都府中学堂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如前中国科学院院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前中联部副部长、中国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李一氓，前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李劫人，著名生物学家周太玄，著名音乐理论家王泮祈，四川大学著名教授蒙文通、魏时珍等。这些人不仅学有专长，著述繁富，享誉国内外，而且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站在时代的前列，勇敢地投入革命斗争，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贡献。郭沫若、李劫人在成都府中学堂读书的时间，大约为1909——1912年春以前。当时这所学校是一所充满革命精神的学校，他们热心阅读宣传推翻清政府的《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主报》等，猛烈抨击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当1909年（清宣统元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令周尔怀的警察训练队镇压参加全省学界运动会的学生时，李劫人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带

头驱逐警察训练队，并举行罢课。1911年初，成都发动请愿召开国会的风潮，郭沫若、李劫人被选为代表出席学界联席会议。五月十日，清政府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全川人民的反对。六月十七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郭沫若、李劫人等以激动人心的心情参加了在成都三倒拐（有说岳东街）铁路公司礼堂召开的保路同志成立大会。紧接着，在郭沫若、李劫人等带动下，成都府中学堂学生参加了成都市罢课、罢市斗争。这一罢课、罢市斗争，很快形成滚滚革命洪流，随着湖北武昌起义，终于导致满清王朝的覆灭。

石室讲堂的创建者文翁，他的一生，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他不治家产，不恋故园，勤勤恳恳，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终于任所。《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说：“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足见文翁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和怀念。现在，成都石室中学校门“文翁石室”匾额，是清道光年间四川总督蒋攸锬题写的，它与郭老于解放后亲笔为母校题写的匾额“求实务虚”四个字、邓力群同志于1985年5月“源远流长，后来居上”的题词八个字，交相辉映。

注 释

①穿湔江口。湔江，今柏条河。穿湔江口，指开蒲阳河。蒲阳河下流为青白江。青白江有二源，一为蒲阳河，一为自彭县关口流出的青白江。后者为自然水道。文翁则自今灌县东门外分湔水江北流经蒲阳镇，转而东南流入彭县界，至丽春乡境与青白江合，灌溉灌县东部及彭县、新繁大片土地。

②指《汉书》颜师古之注。

